



2015年第5期
总第51期 2015年06月

基础教育质量监测 信息简报

本期导航

【专题】

开展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是提升国家教育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

【国际视野】

有效学校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吗？

中国和OECD迎来20年合作伙伴关系

OECD PISA in focus——教育中性别不平等的背后是什么？

OECD TALIS in focus——支持新教师

【国内聚焦】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通知（节选）

【监测动态】

2014年度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云南省监测结果报告征求意见研讨会顺利召开

“基于学生发展的区域教育质量提升”项目结题鉴定会和成果发布会顺利召开

教育部网站报道北师大启功教师奖工作

【好书推荐】

区域教育综合改革丛书——《区域教育综合改革若干问题思考》



 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
National Assessment center for Education Quality,MOE,China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Assessment toward Basic Education Quality

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 信息与学术交流部 编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
邮政编码：100875
联系电话：(010) 58800024
电子邮箱：xxb@eachina.org.cn
网 站：www.eachina.org.cn

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
National Assessment center for Education Quality,MOE,China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Assessment toward Basic Education Quality

开展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是提升国家教育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

中国经济时报：为何要对义务教育质量进行监测？我国开展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辛涛：开展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能在整体上把握国家教育质量状况，为教育决策提供数据信息支撑，是提升国家教育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之一。提升教育质量是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清楚整个国家的基础教育质量的“家底”、不太清楚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差异状况、不太清楚实施相关措施和经费投入的成效，迫切需要通过开展质量监测，以掌握教育质量的现实水平，为教育决策提供数据信息支撑。

开展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也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管理效能的重要抓手。当前的教育行政管理更多地依赖于管理者或管理者群体的经验与直觉。个人化的感悟、个体化的经历、个别化的案例对于教育管理影响过大，不仅使决策随意性强、持续性弱、质量难保证，也影响了决策的说服力和公信力。通过开展质量监测能为教育决策提供准确的数据信息，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教育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专业化。

开展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还能克服应试导向的弊端，是推动考试评价制度改革和素质教育实施的突破口。过去由于缺乏科学的基础教育质量评估制度，考试分数成为了学校、家长和教育部门评价学校、教师和学生最重要的指标，基础教育实践领域存在着以中考、高考成绩衡量地方“教育政绩”的倾向，这些原本承担选拔功能的高利害性考试被错误地异化为对基础教育实践的“指挥棒”，阻碍了素质教育的推行，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以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为突破口、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等全方位的监测，能克服应试导向的弊端，有效推动考试评价制度改革和素质教育的实施，是教育观念更新和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突破点。

单大圣：主要是要适应两个转变。一个是义务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义务教育已经全面普及，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提高质量，这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开展质量监测，就是为改善教育质量提供基本信息。另一个是教育治理方式的转变，现代化的教育治理要求将教育中的管、办、评三种职能适当分开，实现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这是一种新的教育管理体制。评价是政府管理教育的基础，对学校办学也有很强的导向作用，目前来说，管和办的力量较强，评这个支柱比较薄弱，造成了政府和学校乃至教师行为的许多扭曲，成为教育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评价也不是没有，比如“两基”国检，为义务教育的普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主要是数量上的评价，对教育质量的评价，主要是依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这是非常片面的，也造成了很多问题，所以开展专业化的质量监测，形成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是完善教育治理的迫切要求。从工作层面上说，开展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一头是为了改善政府对教育的宏观管理，推动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另一头是对学校形成正确的导向，推动教师改进教育教学，提高教育质量，最终还是要引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教育质量观和人才观，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张旭：我国开展这项监测工作，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第一，义务教育实现全面普及以后，提升教育质量成为义务教育发展的中心任务，开展这项监测工作，无疑是逐渐从原本注重对外的硬件设施的监测向注重内在的教育质量等软件设施的转变；第二，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开展过类似的监测工作，这直接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很难从整体上把握义务教育的发展现状，也就很难找准问题对症下药，可以说建立国家层面的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制度，是我国义务教育的现实需求；第三，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有学校26万多所、专任教师900多万人、在校学生近1.4亿人，各地教育发展差异较大，若没有大数据的支撑，将难以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发展情况作出科学预测，先期“一刀切”式的政策极有可能没有明显改善，“因

地制宜、力所能及”地开展义务教育将是不可想象的；第四，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全面开展义务教育监测的基本条件，例如，依托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连续8年开展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提供了积极的借鉴意义；第五，无可辩驳的是世界各国都将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作为深化本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我国开展此项监测有利于我国基础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可以更好地提升我国教育发展的自信。

我国开展这项监测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真实、客观地反映现阶段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现状，并切实把握影响义务教育质量的主要因素，从而切实有效地提高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质量。

更加关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更加关注教育公平

中国经济时报：《方案》具有哪些突出特点？中国的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与我国公众已熟知的PISA（国际学生测评项目）有什么不同？

辛涛：中国的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与PISA测试在目标定位、监测对象、监测内容等方面都有着重大不同。在目标与定位上，PISA是基于未来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比较各参加国义务教育结束时学生的基本素养状况；我国的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是要了解在现行的课程标准和教学实施背景下学生对照课标的达成度以及总体发展状况。在监测对象上，PISA的测试对象是15岁学生；我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是四、八年级学生。在监测内容方面，PISA主要考察学生数学、科学和阅读素养，我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是全面监测学生的德智体美的发展状况。在结果运用上，PISA测试结果通过国际比较，为各国了解本国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分析本国的优势与不足提供信息参考；我国教育质量监测是根据我国国情实际设计，着眼于了解国家的总体状况、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状况以及部分政策措施乃至经费投入的成效，能为国家的教育管理与决策提供比较全面的数据信息的支撑。

实际上，绝大多数参加了PISA等国际测评项目的国家，都基于本国国情设计、建立了体现本国意志的国内监测体系，都从多种渠道获取本国数据信息进行比较分析（如国际横向比较、国内不同时期比较、国内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学生比较），从而发挥监测对决策的影响。

单大圣：我认为，《方案》体现了务实、管用的原则。我们说，评价监测对教学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我们就是要通过改革教育评价，来改进教育教学，但是评价也不能完全脱离教学的现实，否则就会不适应，甚至“两张皮”，最后流于形式。现在国际上的教育质量评价工具不少，有的还比较成熟，我们没有照搬、照抄，而是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照顾广大中小学校的教育现实，着眼于解决义务教育中的突出问题，保证方案既要可操作、还要管用，这样的监测就有生命力。比如与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紧密结合，在学科测试中加强对能力素质的考察，在形式上采取纸笔测试和现场测试的方式，这样的制度设计，教师和学生都比较熟悉，也容易接受。而且，依托从上到下的教育督导系统开展监测，力度也大，工作容易开展，在监测中还针对性地对德育、体育、学生课业负担和义务教育均衡状况进行考查，因此，可以与教育行政部门的常规工作结合起来，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所以是很接地气的方案，当然这与前期长达8年的调研试点是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质量监测与PISA相比，虽然技术上高度相似，区别还是在对中国教育国情的适用性上，实际上反映出我们对教育质量理解上的差异，比如我们更加关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更加关注教育公平，这些都是PISA测试中没有的，另外，还有管理方式上的差异，也具有中国特色。

张旭：该次出台的监测方案有以下特点：第一，监测内容具有针对性。本次监测内容主要涉及语文、数学、科学、体育、艺术、德育等方面。第二，监测对象具有针对性。该监测主要针对四、八年级学生，这是学生认知能力发展和学习能力发展的两个关键期，基本能反映小学、初中的教育、教学质量。第三，监测时间的确定性。本次监测以3年为一个周期，

并且每次监测的内容是分批次进行的,这样的监测工作具有比较大的可操作性。第四,监测结果不与升学挂钩,不对学校和学生进行排队。打破了以往监测的模式,这也是本次监测的特点之一。

该监测与PISA相比最大的不同是,首先,该次监测是在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在我国开展的本土化的监测,而PISA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监测,这是显著的区别。其次,PISA的监测对象是15岁学生,而我国开展的此次监测,监测对象是四、八年级的学生。再次,此次监测的科目除了语文、数学、科学以外,还包括体育、艺术、德育,这也是本次监测与PISA的显著不同。

学生、学校没有必要为参加监测而进行专门的复习准备

中国经济时报:会不会增加学生负担?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与中、高考等传统性考试有什么不同?

辛涛:《方案》明确了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主要着眼于客观反映教育质量现状,推动教育教学工作的改进,而不以甄别与选拔学生为目的,与中考、高考等传统选拔性考试有根本区别。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不同:一是测试目的不同。质量监测侧重于诊断、指导和改进,而中、高考的主要目的是选拔和甄别。二是实施方式不同。质量监测侧重于了解、掌握区域和群体的教育质量,主要通过抽取样本的方式实现,不对学校、学生个体进行评价和排队,而中、高考则对所有学生进行统一测试,并对学生个体进行评价和排名。三是测查内容不完全相同。质量监测不仅对学生学科领域的知识和能力进行考查,也对影响学生学习和身心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问卷调查,而中、高考主要对学生学科知识的掌握情况进行考查。四是结果使用不同。质量监测的结果主要服务于教育决策、改进教育教学,不对学生和学校进行排队,监测结果不与升学挂钩,而中、高考的结果主要供升学参考。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对学生和学校而言都是低利害测试,学生、学校没有必要为参加监测而进行专门的复习准备。我们所有的监测工具,无论在监测前还是监测后均保密,原因之一也就是防止测试题目流出,导致有学校组织学生提前操练,造成不必要的负担。我们希望进行教育教学常态下的监测,获得客观、真实的数据,这样对国家的教育决策才有参考价值。

单大圣:不能简单地说增加了监测、增加了学生测试,就增加了学生负担,关键还是要看监测结果的导向是否合理。监测的目的是改善政府管理和学校教学,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对学生的课业负担进行测查,所以它本身是要推动减轻学生负担的。反过来说,学生负担重与考试的次数并不直接相关,负担主要是心理上的,主要是考试制度不合理,学生就只好被动地学习,因为提不起兴趣,所以负担就会很重。传统的中考和高考制度就有这种弊端,两者都是政府组织的统一考试,注重学科知识的考查,方式也比较单一,主要是通过总分累加的方式对考生进行排队,“一考定终身”成为高利害性的考试,实际上是以考试代替了招生。相比较而言,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主要还是作为宏观管理的手段,反映教育基本面上的情况,目的是提高中小学自身的教育质量而不是向上升学,而且,对学生素质能力的考查更为全面。当然,中考和高考也在改革,考试内容和方式会更加科学,但不管怎样改革,它们都是为上一级学校招生服务的,而教育质量监测则要求学校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张旭:针对该监测是否会增加学生负担,到目前为止还不好下结论,因为我国并不缺乏很好的政策,许多政策的出发点都是很好的,但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常常出现偏差,导致政策执行失真。针对该政策是否会增加学生负担,我们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并积极开展具有针对性的调查,才能对该问题给出答案。

该监测与传统的中、高考有明显的区别:第一,彼此之间的测试目的不同。质量监测是诊断性的评价,而中、高考测试则是结果性评价,也就是说该监测对于学生有没有考好影响并没有中、高考那么严重,因为中、高考有没有考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升学的去向问题。第二,该监测并不具有选拔的功能,而中、高考除了监测的作用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选拔功能。

第三,质量监测侧重于了解、掌握区域和群体的教育质量,主要通过抽取样本的方式实现,不对学校、学生个体进行评价和排队,而中、高考则对所有学生进行统一测试,并对学生个体进行评价和排名。第四,质量监测不仅对学生学科领域的知识和能力进行考查,也对影响学生学习和身心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问卷调查,而中、高考主要对学生学科知识的掌握情况进行考查。

提高监测能力和水平,加强综合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各地方和相关部门在落实《方案》时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辛涛:首先,在思想认识上要全面、正确理解教育质量监测。当前我国教育质量监测还处于起步阶段,是一项新生事物,因此要加强宣传和引导,使得大家能正确认识到教育质量监测的意义、目的和价值,支持教育质量监测工作的开展,对贯彻落实《方案》和监测工作进行周密的安排和部署。其次,各地在操作实施上要科学、规范。教育质量监测是一项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的工作,其对监测实施的操作程序有着较高的要求。因此,各地和相关部门要做好培训工作,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监测实施手册》等相关材料,熟悉操作实施的流程和规范要求,明确相关人员职责,确保监测实施工作按照标准化流程开展,确保数据的真实和客观。再次,要加强对监测结果的使用。应将监测数据结果作为政府决策、教育教学改进、督导问责的客观依据,真正发挥质量监测工作的价值。

单大圣:前面说了,评价监测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工作,在教育治理体系中,它是与政府管理、学校办学并列的教育管理体系,所以它是一个体系建设。我认为,《方案》的出台只是开了一个头,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比如机构建设、经费投入、队伍培养培训、工具开发、能力建设等,现阶段我们能够依托教育督导系统开展工作,从长期看,还是要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监测队伍。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好教育质量监测的导向作用,提高整个地区的教育现代化水平。因为监测是全覆盖的,又是指挥棒,牵动着各方面的“神经”,如果与干部考核制度结合,对整个教育系统的理念、工作方式和体制机制都会产生巨大冲击,但是,到底能不能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还有艰巨的工作要做。一方面,要提高监测能力和水平。在高考分省命题过程中,就发现各省命题水平很不平衡,所以,能力建设十分重要。另一方面,要加强综合改革,要将完善质量监测体系与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结合起来。如果政府职能没有转变,学校还是按照行政机构的方式运行,监测评价这个支柱就难以发挥作用。

张旭:我国开展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一是客观性。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科学设计监测指标和监测流程,准确反映教育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二是规范性。以国家教育法律法规和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为依据,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教育教学差异和不同类型学生的特点,规范流程,严格操作,确保监测结果真实有效。三是引导性。全面监测学生德智体美各方面,重点考查学生健康水平、综合素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引导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推进素质教育有效实施。四是真实性。要按照《方案》规定,真实地开展监测,坚决杜绝地方为在监测中获得比较好的“成绩”而背离《方案》的规定,导致对该监测虚假地执行。五是循序渐进原则。《方案》毕竟是刚刚在我国实施,绝对不能“好大喜功”、迈大步子,使《方案》“悬浮”于我国教育实际,所以必须明确我国教育发展的实际,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地开展监测。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有效学校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吗？

托马索·阿伽斯汀 (Tommaso Agasisti)

托马斯 J. 亚历山大奖获得者 (Thomas J. Alexander Fellow) 教育和技能理事会成员

我们对教育系统和组织效率的分析是站在了当今对政策和学术争论的最前沿。公共预算经费缩减、公共服务竞争加剧、学校活动投入—产出信息的透明度要求提高等多种因素使得“效率”的重要性到达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从这个角度分析，许多国家的财政整顿将取决于本国政府对公共支出效率信息的主动运用能力。就教育领域而言，提供教育机构清晰明确的量化信息已变得更加重要。

我们在经合组织教育工作文件中提出了一个对 PISA 数据创新性使用的想法，即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学校效率的国际比较。具体而言，我们运用 2012 年 PISA 数据对 30 个国家超过 8600 所学校的效率进行比较分析。本研究解决以下重要问题：

- a) 在样本中的 30 个国家里，不同国家的学校效率差异如何？这些差异是由于学校间的差异引起的还是由于国家间的差异引起的？
- b) 哪些因素与学校的效率得分有关？这些因素在国家间是否具有普遍性？
- c) 在学校层面上，效率和公平之间是否存在可平衡性？

以上三个问题对政策和管理都具有一定的意义，每一个问题也都能够去探索潜在的基准行为 (benchmarking exercises)，这些行为激励学校校长去寻找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学校，并进而探究其成就取得的动因。

我们通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 技术 (其测量的效率得分在 0~1 之间，“1”代表样本中效率得分的最大值) 发现，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甚至在于同一国家中学校的效率分差很大。当把所有的学校都考虑进来分析的时候 (包括刚达到国际通用基准的学校)，我们发现学校的平均得分提高了 27%，提升幅度从 15% (新加坡的学校) 到 33% (斯洛文尼亚的学校) 之多。表 1 重点表明了在同一国家内学校效率得分的分散性；这些得分包含了不同国家间学校效率得分的全部分布情况，并且掩盖了大量的学校内部变量。

我们比较了同一国家每一所学校的运行状况，学校产出 (output) 平均提高了大约 15%，提升幅度在 6% (爱尔兰的学校) 到 22% (斯洛文尼亚的学校) 之间。该结果表明为效率分析研究一个国际基准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从样本学校具有多元背景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发现其提升空间是很大的。国际基准行为是以更小的代价追求实现更大目标的选择。

我们同时也研究了是否在学校和国家层面上存在与效率有关的因素。这些二级变量被分为三组：学生特征 (学生社会经济地位除外)、学校的一般特征、学校的实践和过程。其中，“学校的实践和过程”变量能够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学校管理者采取行动提高学校效率。研究结果显示每所学校的“学生容纳人数”特征 (诸如女生和移民学生的比例、社会经济背景等等) 解释了学校之间效率的大多数变量。此外，有关学校的其他因素 (比如课外活动、校长领导风格等等) 在校际之间学校效率的问题上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在研究的最后一部分，我们讨论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不平衡性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效率更高的学校往往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根据在学校中测定的得分在熟练水平 2 之上 (PISA 测验中的基准值) 的学生的百分比，我们发现效率得分与学校是否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有关。

研究中方法和数据来源的局限性决定了评估所得的效率得分仅仅是真实效率的代表值。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分数并没有提供在学校层面上精确的测量措施，通过这些测量结果给学校排名的任何努力也将会是不合理的。然而，这些评估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国际和国内两个角度上清晰的学校效率分布图景。

我们期望这些努力能够有助于引导研究者把注意力转到这个主题上来，进而深入探究影响教育效率的因素。

图片来源：Authors' elaborations on PISA 2012 data, www.oecd.org/edu/Figure2.pdf 监测中心信息部组织审译

中国和 OECD 迎来 20 年合作伙伴关系

过去几十年，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按照几年前 OECD 的估计，2011 年中国和印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24%，预计到 2060 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 46%，超过现有 OECD 成员国的经济总和。

这些转变同时亦反映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变化中，例如 OECD 作为积极合作伙伴所参与的 G20 的作用正不断扩大。这些转变还反映在 OECD 与非成员经济体，特别是与一些关键伙伴如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之间不断加深的合作上。今年，随着中国和 OECD 建立对话合作关系踏入第 20 个年头，这一过程也立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中国和 OECD 之间的合作源于 1995 年举办的一次关于贸易和投资的研讨会。自此之后，双方的合作取得了长足进展：“今天，已经有 30 多个中国部委和机构与 OECD 开展了合作，”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纪念双方合作 20 周年的宣传册中写道。OECD 与中国的合作领域包括经济政策、贸易、投资、发展、财政和税收、科技、环境、教育、农业、统计、反腐、竞争以及全球治理等诸多领域。

上述合作中，较为显著的方面包括 OECD 的定期中国经济调查，中国在一些重要的 OECD/G20 举措，如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 (BEPS) 中的积极参与，以及上海参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2012 年，上海学生继续保持了上一轮的强劲表现，在全球学生中排名第一。随着北京、江苏和广东陆续加入 2015 年的 PISA 评估，中国正着手深化其对 PISA 项目的参与度。

对中国和 OECD 而言，这种伙伴关系显然使双方获益良多。在二十周年纪念册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把这种伙伴关系描述为“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决策能力”。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这种“务实高效”的合作“对于我们了解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政策和经验起到积极作用 我们了解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政策和经验起到积极作用 我们了解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政策和经验起到积极作用 我们了解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政策和经验起到积极作用 我们了解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政策和经验起到积极作用 我们了解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政策和经验起到积极作用 我们了解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政策和经验起到积极作用 我们了解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政策和经验起到积极作用 我们了解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政策和经验起到积极作用 我们了解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政策和经验起到积极作用 我们了解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政策和经验起到积极作用”。

而在 OECD 方面，秘书长 Angel Gurría 表示，中国与 OECD 机构的积极交往“使探讨更为充实，使经合组织承担的工作更具针对性且更有价值”。他补充道，中国对某些 OECD 法律文书的遵循“可以加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国家为处理共同挑战所作出的努力”。

OECD 经济与发展审议委员会 (EDRC) 主席 William White 也强调了对于 OECD 的重要性：“我们不仅看到中国正在学习他国经验，而且也看到中国在传授经验。近几年来中国的显著进步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许多借鉴之处。我们委员会在对其他国家的审议中也经常援引”。

OECD 成员国向中国取经的一个实例来自于英国与上海开展的一个数学教师交流项目。“我们的教师能够从上海了解到最有效的教学方法，并将这些经验带回英国，然后通过我们的数学教学中心网络，让所有学校都从中受益，” 英国学校改革部国务大臣 Nick Gibb 写道。

在过去 20 年成功合作的基础上，中国与 OECD 未来的合作将会更进一步。去年 11 月，OECD 与商务部签署了一份合作谅解备忘录。OECD 表示，这份协议“规划了未来双方合作的共同蓝图，把 OECD 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资料来源：OECD 中国官网

OECD PISA in focus——教育中性别不平等的背后是什么？

■尽管 PISA 揭露了不同性别之间巨大的阅读差异，支持 15 岁女孩在数字阅读技能测试中差距更小。但事实上，关于成人技能的调查显示，在数字化文化水平方面，16 至 29 岁的青年在性别上并没有明显差异。

■男生更有可能在学校里无所作为，当他们同一大批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弱势的同学一起入学时。

■当女生被要求像科学家一样思考时，她们（即使是学习优良的女生）跟男生比起来更倾向于表现不佳。比如她们被要求用数学化的方式明确表达情景，或是按科学的方法解释现象。

■父母更加倾向于期望他们的儿子，而不是女儿，去从事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领域的工作，即使他们 15 岁的儿子和女儿具有相同的数学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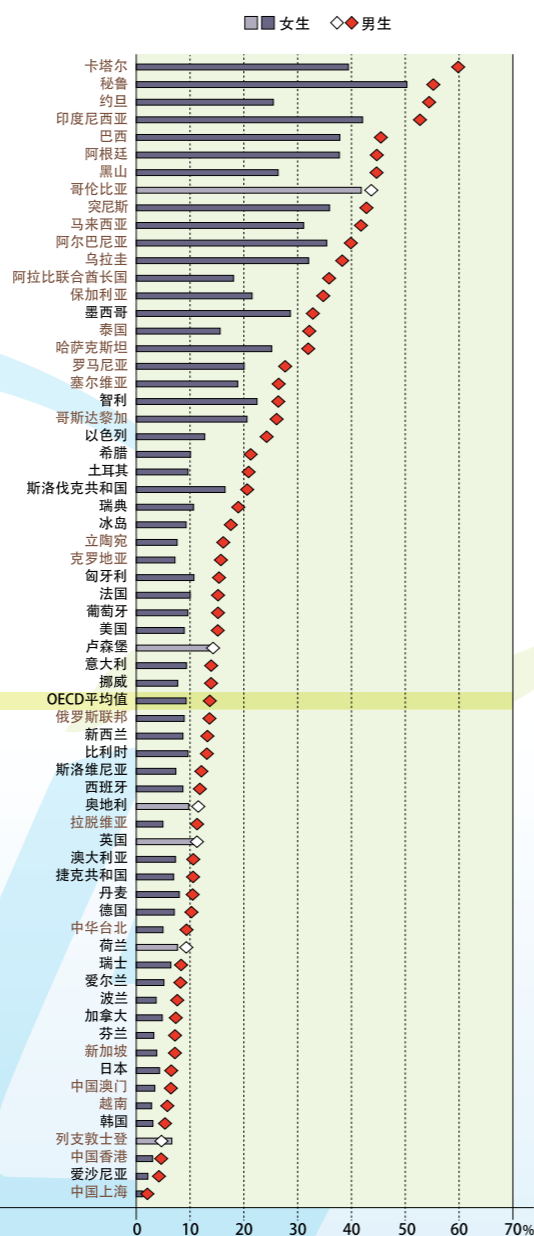
在过去的 100 年，经合组织国家作出显著改善，缩小和弥补了长期存在的性别差异，表现在教育和就业中的多个方面，包括受教育程度、工资以及劳动力市场参与度。这样一个事实意味着：资质不论性别。被给予了平等的机会，男生和女生、男人和女人都有平等的达到最高水平的机会。

但是在教育中，新的性别差异正在发生。年轻男性更加显著地倾向于比年轻女性更少忙于学业，而且具有较低的技能水平和较差的学业成绩。他们也更可能提早离开学校，而且通常没有取得毕业证书。举个例子，经合组织国家的男生比女生高出八个百分点，更有可能声称上学是在浪费时间。同时，在高等教育和除了高等教育的其他阶段，年轻女性在数学、物理科学以及电脑运算等领域的人数不足。在 2012 年，初次进入大学的年轻女性中只有 14% 选择了与科学相关的领域进行研究学习，其中包括工程学、制造业和建筑学。相比之下，那年进入大学的年轻男性有 39% 选择这些领域中的某一个进行研究学习。

男生学习成绩不良

PISA 发现 15 岁的男生比同龄女生在总体上更有可能成为低成就者。2012 年，14% 的男生和 9% 的女生没有达到 PISA 三个核心学科（阅读、数学、科学）中任何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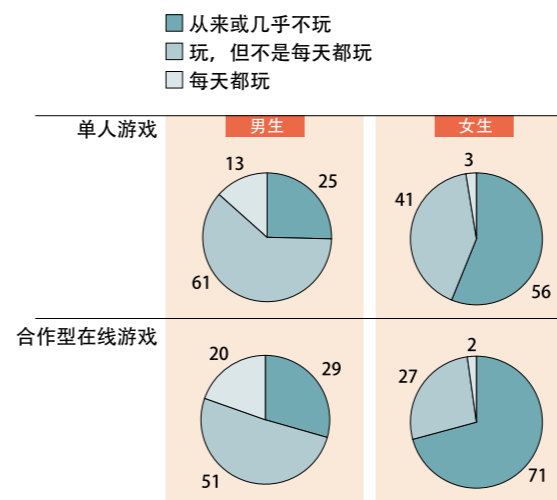
男生更有可能在 PISA 三项核心学科上都达不到标准
阅读、数学、科学水平在等级二以下的男女百分比显示性别差异



注：性别差异显著的数据由更暗的颜色标记。国家和经济体根据在阅读、数学、科学方面具有较差表现（低于PISA水平等级二）的男生数量百分比进行降序排列。

来源：OECD, 2012年PISA数据

在校外玩视频游戏的性别差异显著
经合组织国家的学生百分比



来源：OECD, 2012年PISA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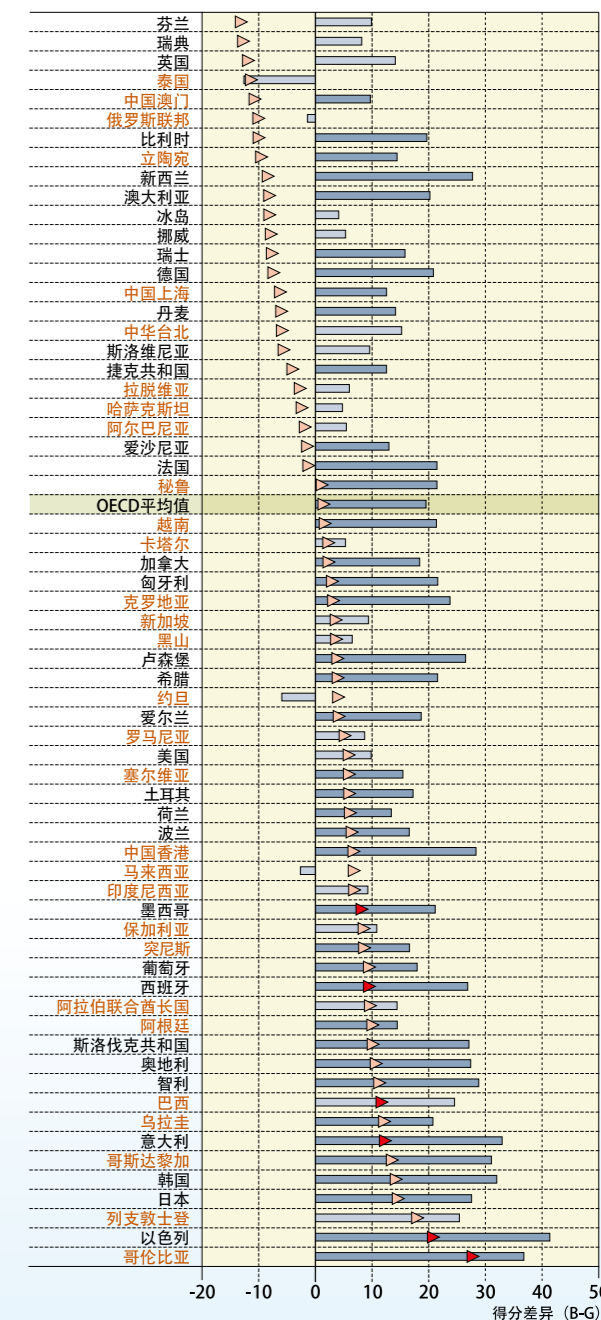
学科的熟练程度的基本线水平。实际上，这些没有达到任何一个学科的基本水平的学生中，十个里有六个是男生。这里有大量导致男生在学校中糟糕表现的可能因素，而且很多都与男生和女生的行为差异有关。举个例子，男生比女生每周少花一个小时在家庭作业上，每周花费在作业上的一个小时则转化成了在 PISA 阅读、数学和科学测验上多得的 4 分。在学校之外，男生比女生花费更多的时间玩视频游戏，花费更少的时间去享受阅读，尤其是一些复杂的文本，比如小说。阅读的熟练是进行其他学习的基础；当男生阅读能力不足，他们在学校其他科目上的表现也会很糟糕。

女生缺乏自信

在参加 PISA 的大多数国家和经济体中，在有良好表现的学生中，女生比男生在数学方面做的更差；没有国家的女生在这个层次比男生做得更好。总体上，女生比男生缺乏自信去通过自己的能力解决数学或科学问题。女生也更加倾向于对数学表现出强烈焦虑，这在学习成绩优良的女生中也是存在的。平均上，经合组织国家中成绩优良的女生和男生在数学成绩上的得分差异为 19 分。然而，当比较一些男生和女生（他们具有相似的对数学的自信力和焦虑水平）时，成绩中的性别差异便消失了。

当男生和女生对他们的能力同样有自信，
数学成绩方面的性别差异缩小

说明数学自信心方面存在性别差异之前的性别差异
说明数学自信心方面存在性别差异之后的性别差异



注：男生和女生得分差异显著的数据由更暗的颜色标记。国家和经济体，根据说明数学自信心方面存在性别差异之后的得分差异，进行升序排列。

来源：OECD, 2012年PISA数据

PISA 表明，当女生被要求处理那些与平时在学校中常规遇到的数学或科学问题相似的问题时，她们能做得更好。但当被要求“像科学家一样思考”的时候，女生与男生相比，表现得相当不佳。

比如说，当女生被要求用数学的方式明确表述情景时，与男生比较，她们未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平均上，经合组织国家的男生的这项技能比女生高出 16 个 PISA 得分，等价于将近五个月的学校学习。对于在给定情境中运用自己的科学知识，科学地描述或解释现象，预测变化，男生也做得比女生好，高出女生 15 分。像科学家一样思考的能力中的性别差异也许与学生的自信相关。当学生更加自信时，他们给予自己失败的空间，参与试误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数学和科学知识的学习是基本的。

这些结果对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PISA 向来发现，在总体上，女生比男生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具有更高期望；但是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平均少于 5% 的女生深思熟虑地去从事工程和电脑运算工作。事实上所有国家，心想从事电脑和工程行业的男生数量都超过了考虑这个职业的女生数量。

相比之下，男生比女生看上去有更好的准备步入劳动力市场或找到一份工作。PISA 发现，报告自己没有学过如何准备工作面试的 15 岁女孩的比例比同样这样报告的男孩多 10 个百分点。与女生相比，更多的男生报告说，他们通过实习和工作观摩已经参与过这样的亲身实践活动。

随着男孩逐渐成熟成为年轻男人，他们在工作和生活经历中同样学到一些他们在学校中没有学到的阅读技能。

2012 年成人技能调查结果中，成人素质能力国际评估结果（OECD 项目的一项成果）发现，16 至 29 岁的青年在素质水平上并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工作者在他们三四十来岁，特别是五六十来岁时，男性比女性更可能

更好地去阅读、写作，在工作中运用解决问题的技能。

怎样缩小或弥补教育中的性别差异

父母可以在子女的学业和子女对未来的期望抱负上给他们平等的支持和鼓励。但 PISA 结果显示这并不是总是发生。在所有调查了参加 PISA 测试的学生的家长的国家和经济体中，父母更倾向于希望自己的儿子，而不是女儿去从事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领域的工作，即使他们 15 岁的儿子和女儿有相同的数学水平。

教师可以通过更加注意可能影响对学生们评分的性别偏见，来帮助缩小或弥补性别差异。他们也可以接受额外的训练，去学习如何对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弱势的同学提供支持。因为 PISA 发现，男生与一大群处于弱势的同学入学时，他们更有可能发挥不出自己的学习能力，学习成绩低下。另外，学生们（尤其是女生）被老师要求试着独立解决数学问题时，他们更能在数学上取得更好的成绩，因此教师可以通过一些教学策略去要求更多的学生。

在一些 PISA 中具有顶尖表现的国家经济体中，比如香港（中国）、上海（中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女生在数学方面和她们的男同学表现得同样好，而且能比世界多数其他国家的所有男生获得更高的分数。类似地，在所有国家和经济体中，男生比女生在阅读上的表现更差。但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在一些其他地方，处于顶尖教育体系中的男生在阅读方面能取得比女生高得多的分数。

结语：PISA 说明学业表现上的性别差异并不是由先天的能力差异决定的。如果要使男生和女生都能了解他们的全部潜能、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幸福有所贡献，就需要父母、教师、政策制定者以及舆论领袖的协同努力。

资料来源：OECD 网站，监测中心信息部组织审译

OECD TALIS in focus——支持新教师

■在许多国家，鲜有经验的老师（少于五年教龄的老师）比更有经验的老师更可能在学校工作中遇到挑战，更难以表现出他们在教学能力中的信心。

■大多数国家为了帮助老师准备他们的工作，设置了一些适当的活动，比如入门培训和指导项目。

■大约有 44% 的老师在校长说所有的新教师都可以接受正式入门培训的学校工作；76% 在可以接受非正式培训的学校工作；22% 在只有刚刚开始教书的教师才可以接受培训的学校工作。

■与校长报告这些项目的存在相比，教师报告参与这些培训和指导项目的更少。

新老师面临的挑战

2008 年教与学国际调查（TALIS,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亚太经合组织，2012）阐明了新教师需要面临许多的挑战，比如需要努力维持课堂秩序。2013 年 TALIS 通过检查新教师和更有经验的教师是如何被分配到具有挑战性的学校的，扩展了对于新教师工作环境的理解。的确，可以预期的是，教育体系会在最大程度上利用它们的人力资源，最优经验的教师就被分配到最具挑战性的学校。然而，TALIS 数据显示，相反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在大多数参加 TALIS 的国家中，新教师比有经验的老教师更有可能去那些超过 30% 的学生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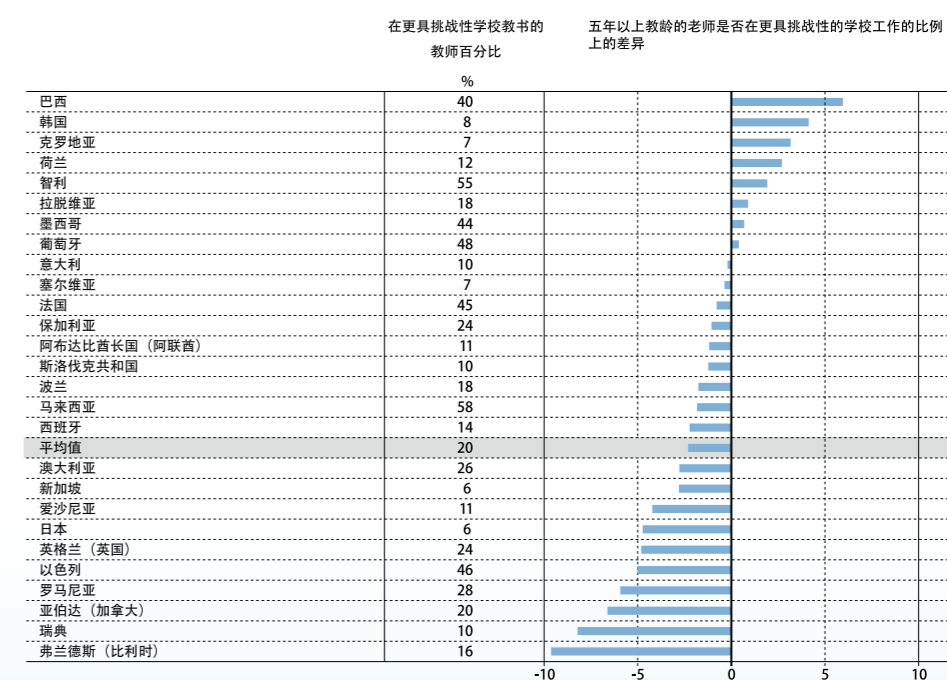
是来自处于社会弱势地位家庭的学校教书（图 1）；或是至少有 10% 的学生有特殊需求的学校；或是去一些学校，它们至少有 10% 的孩子第一语言和授课语言不同。

除此之外，在参加 TALIS 的国家中，未满五年教龄的老师比有经验的老师更有可能去农村地区学校教书，这些学校通常配备更少的资源。TALIS 显示，老师的自我效能感能随时间推移普遍增强。虽然新老师比他们更具经验的同事在教学能力方面更缺少信心，但他们经常面对更具挑战性的工作环境。经验需要花时间去积累，但是对于教学能力的信心通过参加专业培训就能得到提升，比如参与入门培训和指导项目。

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在许多国家学校中都存在对于有经验老师不公平的分配，当考虑到学生的构成及学校的位置（城市对乡村地区）时，

有经验的教师与新教师在至少有30%的学生来自社会弱势地位家庭的学校教书的差异



注：正数表明有经验的教师在具挑战性的学校工作的比例更高
来源：OECD, 2013年TALIS数据

这样的分配更有难度，更具挑战性。与此同时，在教师职业生涯的初始阶段，他们对于自己能力的自信倾向于是最底的。低水平的自信和极具挑战性的环境相结合，再加上几乎不能向有经验的老师寻求帮助，加大了新教师离开这个职业的可能性。为了避免这种人力资本流失，国家应该根据学校的需要对教师进行更加协调的分配。

新教师支持项目的实用性

入门培训项目是在老师第一次常规教学阶段中进行的，项目形式本质上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亚太经合组织，2014a）。这些活动可以帮助教师将岗前培训和教室中实际的日常工作联系起来。

接入入门培训的方式各不相同。如图2所示，44%的老师在校长说所有的新教师都可以接受正式入门培训的学校工作；22%在只有刚刚开始教书的教师才可以接受培训的学校工作；76%的老师在可以接受非正式培训的学校工作。在巴西、波兰、葡萄牙和西班牙，70%-80%的老师都接受不到正式的入门培训项目。在日本和墨西哥，大约有60%的教师接受不到非正式的入门培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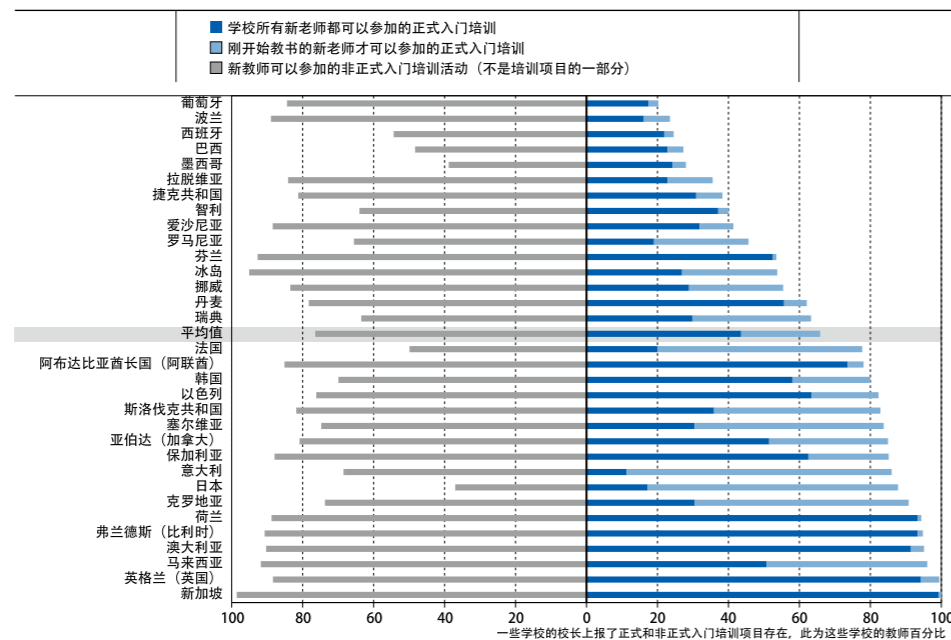
新教师可以通过与更有经验的教师（通常被称作导师）配对的方式来得到帮助和支持。所有 TALIS 国家中，大约有75%的老师在校长报告说有导师指导项目存在的学校工作。然而在国家之间，项目的实施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这些项目是不是只提供那些刚刚开始教书的老师，还是刚刚到这个学校的老师，或是所有的教师。

新教师支持项目的参与度

在大多数 TALIS 国家，教师的参与度比校长报告的参与这些项目的机会更少。如图3所示，70%的少于三年教龄的教师在可以接受入职培训的学校工作，然而只有大约50%的教师参加了这样的项目。

在很多国家，与能接触到指导项目的机会相比，该项目的参与度更低。这有一部分是因为并不是每个老师都会有一个导师，而且一些老师自己也会充当

参与正式和非正式入门培训项目的机会



来源: OECD, 2013年TALIS数据

一些学校的校长上报了正式和非正式入门培训项目存在, 此为这些学校的教师百分比

导师的身份。然而尽管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一些国家参与项目的机会和教师参与度之间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比如，在荷兰，有71%的老师在有指导项目的学校工作，然而只有17%的老师有导师。

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接受入门培训和指导项目可以为新教师提供支持帮助，但是在很多国家，这些支持计划的参与度都不够。参加的机会与实际参与度不匹配，教育体系应该调查新教师参加培训和指导项目所面临的障碍。

这些活动不仅仅是对于新教师的投资，它们也同样会对这个体系产生作用：TALIS 表明，参与入门培训项目的教师更有可能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成为导师并进行专业发展。

结语：新教师经常比更有经验的教师面临更具挑战性的工作环境；然而他们经常缺乏职业经验和信心去轻松应对这些挑战。教育体系应该重新审阅分配老师到那些更具挑战性学校的政策，同样也应该增加新老师通过入门培训和指导活动接受专业支持的机会。同时也要注意通过消除老师参加项目的障碍，实行一些激励措施，来最大程度上提高教师的活动参与度。

资料来源: OECD 网站 TALIS 数据库, 监测中心信息部组织审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年)的通知 (节选)

为深入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部署和要求，采取切实措施加强老少边穷岛等边远贫困地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明显缩小城乡师资水平差距，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特制定乡村教师（包括全国乡村中心区、村庄学校教师，下同）支持计划。

乡村教育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受城乡发展不平衡、交通地理条件不便、学校办学条件欠账多等因素影响，当前乡村教师队伍仍面临职业吸引力不强、补充渠道不畅、优质资源配置不足、结构不尽合理、整体素质不高等突出问题，制约了乡村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对于解决当前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吸引优秀人才到乡村学校任教，稳定乡村教师队伍，带动和促进教师队伍整体水平提高，促进教育公平、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重要意义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薄弱环节和短板在乡村，在中西部老少边穷岛等边远贫困地区。发展乡村教育，帮助乡村孩子学习成才，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发展乡村教育，教师是关键，必须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在稳定和扩大规模、提高待遇水平、加强培养培训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乡村教师队伍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教育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广大乡村教师为中国

二、总体要求

(一) 基本原则。

- 师德为先，以德化人。
- 规模适当，结构合理。
- 提升质量，提高待遇。
- 改革机制，激发活力。

(二) 工作目标。

到2017年，力争使乡村学校优质教师来源得到多渠道扩充，乡村教师资源配置得到改善，教育教学能力水平稳步提升，各方面合理待遇依法得到较好保障，职业吸引力明显增强，逐步形成“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局面。到2020年，努力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甘于奉献、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坚强有力的师资保障。

三、主要举措

- (一) 全面提高乡村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水平。
- (二) 拓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
- (三) 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

- (四) 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
- (五) 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
- (六) 推动城镇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
- (七) 全面提升乡村教师能力素质。
- (八) 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

四、组织实施

- (一) 明确责任主体。
- (二) 加强经费保障。
- (三) 开展督导检查。

资料来源：教育部网站，监测中心信息部整理节选

2014年度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云南省监测结果报告

征求意见研讨会顺利召开



2015年6月3日上午，云南省2014年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报告征求意见会在北京顺利召开。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协同中心）常务副主任陈光巨、协同中心常务副主任辛涛教授、副主任王耘教授，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建颖、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军、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评估室主任周家荣以及评估室研究员刘虹出席会议，协同中心报告撰写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研讨会上，陈光巨副校长首先介绍了我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历程、当下全国的局势以及以后的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趋势。王耘教授发言表示：“科学的教育公共政策，这个源于科学的监测。以前更多的只依赖成绩，但现在用监测这种方法，这对基础教育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我们期待监测结果带到云南，指导云南教育质量提升实践，并帮助云南培养更多的监测方面的人才。”紧接着，王耘教授向云南的领导专家介绍了云南省2014年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主要结果：涉及到云南省学生数学学业表现、体质健康状况、以及师资队伍、课程和资源状况。听完监测结果报告之后，王耘教授、杨副院长、周主任分别就自己关心的问题与协同中心进行了研讨。并商定在6月底正式去云南省反馈报告结果。

资料来源：监测中心网站

“基于学生发展的区域教育质量提升”项目结题鉴定会和成果发布会顺利召开

近日，我校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与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共同合作开展的《基于学生发展的区域教育质量提升》项目结题鉴定会和成果发布会顺利召开，研究成果获得专家组和媒体高度评价。

5月24日，项目结题鉴定会在我校京师学堂召开。鉴定专家组由国家总督学顾问、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柳斌担任组长，成员包括教育部综合改革司司长刘自成、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王定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田慧生、中国教育报刊社社长兼《中国教育报》总编辑翟博、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周谷平、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褚宏启等。我校校长董奇，浙江省教育厅副巡视员吴永良，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马里松，上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叶榕，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负责人等相关领导出席了结题会。

董校长在致辞中指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之后，我校积极发挥教育研究优势，与杭州上城区深入合作开展区域教育改革探索，通过五年的努力，取得了有益经验。希望课题组围绕提升现代教育治理能力这一综合改革目标，进一步听取专家意见，凝练项目成果，深化改革经验，更好地发挥对上城区乃至对全国区域教育综合改革的指导作用。

项目组随后就研究工作进行了汇报，我校和杭州市上城区项目负责人分别汇报了项目的缘起、核心理念及设计思路，项目实施的具体过程及效果。专家组对上城区管办助评各归其位的治理经验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上城模式为区域教育综合改革领域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专家组对我校敢于抓住教育改革中的真问题，建立区校合作模式服务基础教育予以充分肯定，认为该项研究理念正确，改革的思路科学，效果良好，经验值得推广。专家组一致同意项目通过结题验收。

25日，项目成果发布会在京师大厦召开，浙江省教育厅副巡视员吴永良，我校副校长陈光巨出席发布会。

陈光巨副校长指出，我校与杭州上城区通过五年的合作探索，从宏观顶层制度设计到微观个体发展支持的多个层面上，整体构建了一套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一揽子综合改革方案，得到专家充分肯定。希望北京师范大学、杭州上城区以及媒体携手共同为中国区域教育综合改革作出贡献。

随后，项目组全方位深度展示了5年来在区域教育综合改革领域所做的开创性探索，并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等30余家与会媒体开展了深入互动。

在教育部颁布《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之际，我校与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在区域教育综合改革领域开展的现代教育治理模式的成功探索，将对进一步推进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资料来源：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北师大社会科学处

教育部网站报道北师大启功教师奖工作

教育部网站6月10日以“北京师范大学响应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开展首届启功教师奖评选活动”为题，报道了我校启功教师奖工作。全文如下：

北京师范大学响应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开展首届启功教师奖评选活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讲话精神，响应中央“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北京师范大学与光明日报社联合发起设立“启功教师奖”，重奖在县及县以下基础教育一线，尤其是在老少边贫岛地区从教满30年，做出杰出贡献的教师。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首届将评选出10名，每人奖励50万元人民币。

坚持寓教于评，凝聚社会共识。奖项以已故我国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启功先生命名，弘扬启功先生倡导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精神，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崇智尚学的优良传统。通过树立无私奉献的师德典范，引导广大师生长期从教、终身从教，号召全社会关注、关心基础教育一线教师，共同为教育发展做贡献。学校将评奖作为广大师生接受理想信念教育、陶冶道德情操的重要载体，特别征选80多位师生组成18支师生志愿服务团，在《光明日报》记者站的协助下，实地调研、采访候选教师扎根乡村、甘于奉献的动人事迹，为评审工作和宣传报道收集第一手资料，让师生近距离接受生动的师德教育。

坚持优中选优，严格遴选候选教师。学校和光明日报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整合多方资源，按照“四有好老师标准，认真评审，严格把关。在各级教育部门的支持下，从近年来教育部表彰的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模范教师等3000多位优秀教师中，逐步遴选出60余位候选教师。这些教师来自全国21个省（区、市），长期坚守在基础教育一线，为基础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坚持公开公正，严格评审程序。组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评审委员会，聘请教育专家、教育管理者、特级教师、新闻媒体和社会机构代表等担任评委。深入挖掘、搜集候选人事迹，形成客观公正的调研材料，提交评审委员会。明确初评、复评、终评三级评审程序，通过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的方式进行评选。评审结果将及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链接：<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139/201506/189030.html>）

资料来源：北师大网站首页

区域教育综合改革丛书

——《区域教育综合改革若干问题思考》



教育关系到国家的振兴与民族的未来，涉及到千家万户，关乎人民福祉。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已逐步从注重数量与规模转变为追求质量与效益，区域教育综合改革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形式。

《区域教育综合改革若干问题思考》从北京师范大学与杭州上城区合作项目的实践出发，结合对区域教育综合改革认识的概括和提炼，针对“区域教育综合改革”进行探讨，全书从思路与途径、发展规划以及体系建构三方面入手，详细而全面得进行了论述。

《区域教育综合改革若干问题思考》共分为七章。全书的第一章从“思路与途径”的角度出发，在阐述区域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域教育综合改革的总体思路，包括明确改革目标、确立改革依据、明确行动路径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措施。全书的第四章则从“学校发展规划”入手，准确指出当下学校在推动其发展规划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并深入地分析和讨论了困境出现和难以改变的原因，提出学校发展规划走出困境的方法。全书余下的四章均从“体系建构”的角度出发，包括，一、发展评价体系：

建立发展性评价体系，以及其为区域教育综合改革和质量提升提供的重要保障；二、服务型区县教育体系：基于组织变革理论，结合实践，提出构建服务导向区县教育新体系的依据、思路和方式；三、区域学生成长支持体系：从学生成长的概念到区域学生成长体系的特征、基本内容和途径进行详细分析；四、区域教育管理与服务的信息化支持体系：课题组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出了构建信息化支持体系的新的思路、目标和手段。除此之外，本书也在第五章对于教育改革的有效途径之一——“区域整体推进教与学的改革”的合理性、基本理念、总体思路与实践等问题进行了逐一探讨。

希望本书能对从事教育改革和区域教育的研究者有所启发，对教育管理者实施改革有所帮助。

资料来源：监测中心信息部根据该书内容节选